

为新时代考古学人才培养贡献高校智慧和力量

——写在“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出版之际

白云翔 方辉 王芬

为了适应新时代大规模培养高素质考古专业人才的需要,由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编写、科学出版社作为重大项目负责出版的我国第一套“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全13册)正在陆续出版发行。当此之时,这里就这套系列教材编写的相关问题略做说明,跟学界交流。

一

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来的辉煌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多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揭示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及其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贡献。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当今我国的考古事业进入到空前发展、空前繁荣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不断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我国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一大批热爱考古、甘于献身考古事业的新时代考古学专业人才。“人才之成始于学”,考古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始于大学的专业教育,而专业教育离不开专业教材。“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中华书局宣言书》,1912年)。毫无疑问,教材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核心和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新中国考古学专业教育的出现——1952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举办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952-1955年共举办四届)、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我国首个考古专业,考古学界就着手考古教材或讲义的编写,并且逐步形成了重视教材编写的优良传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学教材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出现了内容广泛、类型多样的态势——既有考古学概论、通论性教材,也有断代考古、专题考古、科技考古以及区域考古等教材,在考古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上看,现有的考古学教材还不适应或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国家和有关省级考古机构不同程度扩编的同时,各地又新设立不少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目前近70所高校开设考古文博相关专业”(《中国文物报》2024年9月27日第6版),并且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在我国考古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考古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呼唤更多、更好、更新、更系统的考古学专业教材,尤其是考古学专业教育的基础性教科书。“中国考古学通论”是我国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最基本的主干课程,也是文物专业、博物馆专业本科生的主干课程之一,因此,编写出版一套以断代考古为主、专题研究为辅的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已势在必行。

二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本系列教材由13册构成,其中,断代考古8册,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到宋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3册,即《人类骨骼考古》《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文物保护和文

遗产2册,即《文物保护科学与实践》和《文化遗产概论》。之所以作如此设计,主要基于本系列教材的定位、我国考古学的总体态势、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及考古学教材现状等的综合考量。

这套系列教材定位于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文物专业和博物馆专业本科生必修课“中国考古学”的教材,跨专业考入的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文物专业和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必修“中国考古学”的教材,以及在职文物考古业务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的参考书。就中国考古学通论而言,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时期各个时期的断代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无疑是最基本的内容,所以,本系列教材设有8册,实现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到明清考古的全覆盖。现代考古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文理交叉、文理融合,而以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为基本内涵的“科技考古”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之一。科技考古领域众多,并且新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日益增多,难以在一套通论性教材中全部囊括,于是本系列教材仅选择在我国研究历史长、普及程度高的人类骨骼考古、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各编写1册。考古发掘和研究离不开文物、文物保护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古学的对象和资源主要是地下历史遗迹和遗迹物等文化遗存,而這些地下文化遗存又是整个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保护和利用是考古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有鉴于此,本系列教材设有《文物保护科学与实践》和《文化遗产概论》各1册。这样的设计,既可以基本满足考古专业本科生教学的需求,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新文科建设理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考古学通论教材体系来说,本应设有“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学”——田野考古作为现代考古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其四大支柱——断代考古、专题考古、科技考古和区域考古的基础,乃至本系列教材是“基础性”教材的定位,而考古学又是理论性和实践性俱强、世界性和民族性兼具、多学科交叉融合性突出的人文学科,本系列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 and 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两个坚持”“四个注重”和“三个突出”。

一是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始终把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科学精神贯穿于本系列教材之中,以培养新时代考古专业人为宗旨。

二是坚持以百年來我国考古学发展及其成就的总结和展示为主线,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多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两千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及其对人类的文明的贡献进行考古学书写。

三是注重基础性,即注重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材料、基本认识的简明准确的叙述,



以及学科发展史的简明梳理。

四是注重系统性,即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教材编写经验,注重体系的构建,各册尝试建立各自的学科框架体系和知识体系,简明准确地叙述各自的学科性质、主要特点、基本任务及其成就。

五是注重前沿性,即注重新理论、新方法、新实践、新发现、新认识和新进展的叙述,以及面临问题和发展趋势的思考。尤其重视学科交叉和融合,将新文科理念融入教材编写全过程,单列3册科技考古教材的同时,在断代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教材中也注重吸收最新前沿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

六是注重规范性,即注重概念和术语的专业性和科学严谨,数据、年代等的翔实准确,文字表述、图表等清晰明了,引文、注释等符合学术规范。

七是突出教材属性,强调突出重点与兼顾一般相结合、重点详述与总体概述相结合、点与面有机结合、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作者学术观点的系统论述与不同学术观点的介绍相结合,强调重“述”轻“论”适当“评”。

八是突出中国特色,强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既关注外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更关注中国考古学人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实践和创新,基于现代考古学的中国实践及其成就,用中国学人的历史观、价值观和话语系统进行中国考古学的叙事,探索和尝试构建新文科背景下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考古学教材体系。

三

这套系列教材在广泛调研、反复沟通的基础上,于2022年9月正式启动编写工作,2024年6月起先后交稿进入编辑出版程序。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旧石器时代考古》《夏商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人类骨骼考古》和《文物保护科学与实践》7册已经出版,其余6册即将陆续出版。

这套系列教材编写出版的初心和目标,主要是服务于我国考古事业的大繁荣和大发展,服务于新时代高素质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在职业务人员能力的提高,服务于我国现代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服务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建设,服务于中国考古学更好地走向世界。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这套系列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明确的,编写的要求是总体一致而各册突出其特色——或是侧重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或是侧重于结合案例分析对理论和方法及其应用的介绍——因各册的内容不同而有异……尽管如此,我们毕竟缺乏组织编写系列教材的经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期待着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们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今后不断修订完善,真正实现这套系列教材编写的初心和使命,真正为新时代大规模培养高素质考古学专业人士贡献高校智慧和力量。

(本文作者均系山东大学教授,是“中国考古学通论”系列教材的主编和副主编)

的金背镜均与玄宗千秋节赐镜行为无关。但唐代能被赏赐金镜者的身份,却可明晰为四品以上官吏或王公显贵才能受此恩惠。阎识微和裴氏的身份还未能达到唐代赏赐金背镜的等级,裴氏的金背镜很可能来自其母新野县主。齐东方认为赏赐金银是历代政治活动中通常的行为,论功行赏、赐金银器皿也波及外族。由此可以浅析龙海M13银背镜的由来、渤海墓葬中随葬镜剪的丧葬功能、墓葬年代及墓主人身份等问题。

首先,龙头山发掘者认为龙海M13中所随葬的银背镜、银平脱漆奁、银平脱漆盒是王室成员才能享受到的,由唐朝赏赐的奢侈品。李辰元等人则从金属加工工艺角度同样认为龙海M13银背镜为朝贡交流所得的外来品。因此,龙海M13中所见的镜、漆奁、漆奩等器物,很可能是作为一整套唐代贵族女子日用梳妆用具,通过唐渤之间的政治活动被赏赐给墓主人,供其家眷使用。

其次,王锋钧在《铜镜出土状态研究》一文中指出铜镜在丧葬习俗、民俗观念和宗教信仰影响下衍生出一些特殊用途,其中之一便是作为墓主生前用品随葬,反映了丧葬活动中遵循的“事死如事生”孝道风俗。范淑英通过研究认为镜与剪作为唐代女性的梳妆用品和女工用品,是生前使用的实用品,但也不排除镜剪组合具备压胜之类的功能。龙海M13的铁剪为交股剪,残长30厘米,为体积较大的铁剪,很可能是女工用品。此外,该银背镜钮组中系带尚存,在手持铜镜的使用方式中,在镜钮中穿系绶带为最常见的执镜方式,龙海M13中随葬的镜剪就是墓主生前所用之物,不具备压胜之类的功用。可以认为,龙海M13中会出现铜剪组合就是受到中原墓葬的随葬习俗影响,是渤海贵族妇女对唐代妇女日常生活方式及死后随葬品组合的一种模仿;这种现象既体现出墓主人在渤海社会中具备较高的身份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渤海统治阶层对中原社会生活方式的倾慕。

再次,徐殿魁将盛唐时期划归在7世纪晚至8世纪中期,即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至玄宗开元年末(741年)。他认为银背镜是武则天临朝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一种新工艺镜,而裴氏随葬的金背鸾鸟瑞兽葡萄纹镜表明该类铜镜的铸造年代上限可能早至高宗即位时期。此外,鸾鸟瑞兽镜的年代晚于瑞兽葡萄镜,两者存在一定的演变关系。综合镜背纹饰和镜形两种因素,龙海M13银背镜为鸾兽菱花镜,不见裴氏金背镜中的葡萄纹,龙海M13银背镜的年代要晚于裴氏的金背镜。

最后,在唐代,三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使用玉带,作为等级的象征,不可滥用,且鈚的数目在律法上也有相应的规定。龙海M14的墓主人 为男性,其随葬有一套珍贵的17鈚金托玉带具。若该带具同样为唐朝所赐,那其规制远超出唐律的规定。但同时,M13中随葬的银背镜在材质上低于可赐予四品官员的金背镜,墓葬中出土的玉带与银背镜的拥有者所代表的政治地位与史料记载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即便如此,能使用玉带和银背镜的龙海M13、M14的墓主,无疑是渤海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因此对龙海M13、M14墓主人在渤海国历史上真正身份的探究仍有可讨论研究的空間。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1933年,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指出,三代时及三代以前,中国地理形势上只有东西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争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其中的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傅先生认为商族的“商”是一个动态概念,发端于渤海沿海,活动于今鲁西南菏泽与济宁以及皖北和豫东等地的古兖州地区。傅先生认为殷人本非夷族,而抚有夷之人民土地。夷人活动区域西达豫中,东达东海,北到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傅先生所言“夷”实述“商夷”,恰正是“夷商”同源,抑或是传统认识中商出于夷的最佳诠释。

商丘地区考古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肇启人李景昶先生始,到怀揣商丘情怀的张光直先生,以及近百年来倾注商丘地区考古的诸多知名学者等,均对商丘地区考古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2019年以来,商丘地区考古第四次发掘方兴未艾,尤其在2023年商丘永城王庄遗址发掘中取得重大突破,且对商丘地区考古学文化性质提供了关键证据。2025年12月12日至14日,河南省商丘市召开“豫东考古与殷商探源暨王庄遗址学术研讨会”,笔者有幸参会,并作“商夷早期文化关系考辨”报告。结合会议内容综合分析,以“夷夏东西”中的“商夷”地望看商丘地区考古学文化性质,或许正是商丘地区考古本应循迹的正确路线。有鉴于此,分析并阐释与商丘地区文化性质直接相关的两个疑惑,即商丘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谱系,以及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关系,可对商丘地区文化性质的进一步判定加以佐证。

商丘地区先秦文化谱系的确立

商丘地区先秦文化谱系的确立,对殷商文化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地区相继发掘了商丘县(现为睢阳区)潘庙、虞城县马庄、柘城县山台寺三个遗址,结合出土的文物层,形成了商丘地区由早及晚为仰仰、龙山、岳石、殷商、东周、汉代的文化谱系。其中的仰韶层以虞城县马庄遗址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主要成员的际限根指出,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几乎均衡地具有山东北辛文化因素、郑州地区的大河村遗址和苏北同时期文化的因素,并认为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归为上述的哪一类文化都不妥当,应命名为“马庄类型史前文化”或“马庄文化”。由此分析,商丘地区先秦时期文化谱系始于仰韶明显存疑,且认定该地区先秦时期文化谱系始于仰韶显然不妥。

2021年5月,在商丘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启动仪式上,陈星灿先生在致辞中提及商丘地区古代文化谱系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文化等,这符合豫鲁皖交界地带古文化上限为大汶口文化的客观事实。至于马庄遗址第五层文化遗存的性质,笔者认为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墓中死者有拔牙习俗和头大口附有獠牙更是与海岱地区同时期墓葬特征几乎一致,显然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范畴。

商宋一脉相承,商夷更是同根同源。商丘永城王庄遗址出土的兽形足罐形鼎、背壶、镂空细柄豆、高领壶、桥形钮器盖等主要器物组合,以及墓葬中的枕骨变形和手握獠牙习俗,与东夷族大汶口文化如出一辙。商丘地处东西文化的交汇地带,在交汇地中还存在着大河村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多重因素,但主体因素为大汶口文化无疑。而且,在近年来商丘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商丘地区先秦文化谱系上限为大汶口文化是可信的。

商丘地区大汶口文化层之上叠压有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层之上叠压有岳石文化,以及在夷夏交汇最明显的惠济河两岸还有与岳石文化并行的下七垣文化。商丘地区下七垣文化位于惠济河东岸,以商丘民权牛牧岗遗址为代表,其文化特征与惠济河西岸的开封杞县鹿台岗遗址同类文化遗存相似,同属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杞县鹿台岗遗址龙山文化层之上有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两种并行的文化层,明显是商丘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西进的混合演变体。从商丘地区岳石文化早期的陶器来看,其文化因素多与商丘龙山文化晚期相似,两者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商丘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炊器中陶鼎占据首位,至中后期陶鼎越来越少,陶鬲越来越多,到岳石文化时期,陶鬲成为主要的炊器,一直延续到二里岗时期,且前后岳石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是龙山文化比较典型的子母口陶器有罐、尊、器盖等,与岳石文化子母口罐、尊、器盖亦接近。另外平底盆、浅盘豆也相似。因此,商丘地区岳石文化是由本地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发展演变而来。

综上所述,商丘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谱系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二里岗文化、两周文化。

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关系

岳石文化是否为先商文化,梁丰实先生认为以商关外下层为代表的早商文化的直接来源为岳石文化安邱堆类型,这一文化的创造者为先商时期居民。在梁丰实先生已有研究基础上,笔者进一步通过对商丘地区先商时期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逐一作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根据多年来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可知商丘地区叠压在龙山文化层之上的主流文化为岳石文化,其分布范围与本地的龙山文化十分相似,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总之,商丘地区的岳石文化不论是与本地的二里岗文化,还是与郑商关外期、二里岗下层的早商文化,均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也符合商先族在商丘地区发展壮大,然后“奉桀众以克有夏”,救夏民于水火,并吸收二里头文化的先进文化因素,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里岗文化。

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是海岱地区东夷族创造的考古学文化。东夷文化自北辛文化起,主要历经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三个时期,前后贯穿3000余年,主要分布在海岱地区。考古学上的海岱地区是指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地区,具体包括山东全省、苏北、皖西北、豫东。东夷文化初始分布在鲁中南和鲁北地区、苏皖北部和胶东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遍布于整个海岱地区。结合商丘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析,尤其在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商丘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属于海岱地区范畴。商族奉紂玄鸟图腾崇拜,甲骨文卜辞殷王世系表中有帝誉的记载,而文献记载中帝誉又是东夷始祖少昊的孙子。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可知商出于夷,商夷同根同脉,同出一源。因此,殷商文化起源必须基于“商出于夷”的传统认识,其中岳石文化应为殷商起源文化,也即先商文化。

商丘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是夷夏文化的关键交汇区域,更是研究商夷文化的关键地带。商丘自西向东的文化表现为东夷文化依次渐强、华夏文化依次渐弱的显著特征,其中商汴交界的惠济河流域是夷夏文化交融的最强地带。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以殷商文化为界,之前的起源文化是基于多元文化并存的客观事实,之后的王国、帝国文化是一体文化凝变的客观结果。殷商文化起源研究,必须理清商丘地区的文化性质。要之,商丘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属性当为东夷文化,其中的岳石文化是二里岗早商文化的直接来源。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版责编:郭晓蓉 张 宸

倾慕华风

——渤海墓葬中的铜镜与铁剪

张欣悦

早在对唐墓随葬器物的研究中,便有学者注意到唐墓中一些随葬品摆放的位置较为固定,并存在一定的组合关系。其中,铜镜与特定器物的搭配常见于唐墓之中,尤其镜和剪出土较为常见,且两者的出土位置多位于墓主人头部附近。在渤海墓葬之中,镜与剪也偶有发现,但两者组合出土的情况极少。彭善国在《渤海国文物研究》中对渤海遗址出土铜镜的数量和位置进行了统计:渤海遗址出土的11面铜镜中,7面为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目前,出土铜镜的渤海墓葬中仅龙头山龙海墓区M13发现铜镜与铁剪共出。

龙头山墓地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头道镇东南的龙头山上,由北至南分为龙湖墓区、龙海墓区、石国墓区。龙海墓区位于龙头山墓地中部,作为明确埋葬有渤海皇后和公主的墓区,一直是渤海王室成员墓葬研究的重点。龙海M13、M14为异穴同封墓葬,由墓上建筑和地下砖椁墓室组成,木棺置于砖椁内。其中在M13墓主人头部放1件金钗,头顶出有漆奁、器奩,竝置一铁剪,奩内盛放2件木梳、1件镜、1件蛤盒和3纸袋胭脂。报告推测其墓主人为女性。

龙海M13出土铜镜,镜钮为卧伏的狮子,镜缘为八出菱花。内区狮子左前方为衔枝回首的孔雀。孔雀、凤鸟、狮形兽之间缠枝石榴花相隔,菱花凸出部分上,大约孔雀、凤鸟、狮形兽尾部上方的位置,分别饰有四只或站立或飞翔的鸟。外区每一菱花凸出部分饰三朵缠枝花。最大径20.8厘米,镜缘厚1.6厘米。据报告描述可知此面铜镜为采用新工艺制作的银背镜。金(银)背镜是将整块金(银)片做出装饰纹样镶嵌于镜背的铜镜,相较于其他种类的铜镜,其花纹精细,制作精巧,出土数量少,因此更为珍贵。胡薇通过研究认为金银背镜主要流行于武后至玄宗开元时期。菱花镜形在盛唐时期便较为流行,鸾鸟瑞兽主题纹饰尤其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

通过对唐墓中铜镜出土材料的查找和对比,与龙海M13出土铜镜镜背主题纹饰最为类似的器物还有见于唐太宗司马阎识微夫妇墓中的金背镜。阎识微夫妇墓中东侧裴氏的木棺内随葬有一面金背镜和1件铜剪。不同于龙海M13出土镜剪随葬于人骨头侧,裴氏棺内所见的镜剪随葬于裴氏下肢靠近棺木东侧处。简报称此面金背镜为八瓣菱花形禽兽葡萄纹铜镜,镜钮的兽与龙海M13出土银背镜相似。不同的是裴氏金背镜的镜钮为双兽组。镜背以一周凸棱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八组高浮雕神兽与缠枝葡萄纹,葡萄藤在每组神兽周围均形成一个圆圈,神兽姿态多样。外区为八组高浮雕成对禽鸟,有凤凰、孔雀、鸚鵡及鸿雁等。八个菱瓣内各有一花卉,两侧垂以葡萄果实,以镜钮为中心对称分布。缘内边框上饰缠枝卷叶纹。



龙海M13铁剪



龙海M13银背镜

图片来源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保护中心、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和龙市文物管理所:《龙头山渤海王室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25年。



龙海M13椁内木棺



龙海M13清理后场景

镜背高浮雕图像之间和缘内边框上捶揲有鱼子纹。该镜直径19.7厘米,镜厚1.3~1.4厘米。

阎识微夫妇墓出有两方墓志,可知阎识微卒于圣历二年(699年),裴氏卒于天授二年(691年),二人于神龙二年(706年)合葬在长安万年县。裴氏的母亲为新野县主李令,为皇室宗亲,出身显赫,发掘者推测此面金背镜为皇室所赐。据史料所载,太宗和玄宗均有赐镜于大臣的行为。《旧唐书》卷七八《列传第二十八·高季辅》载:“十八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时称允当。太宗尝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焉。”卷八《本纪第八·玄宗上》载:“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璣、缣彩……”高季辅为太宗时期从三品官员,而玄宗所赐金镜的官吏也 为四品以上官员和王公显贵。依据陈灿平对千秋镜的研究,玄宗千秋节赏赐群臣的千秋镜铸有“千秋”铭,纹饰也以盘龙和对鸟为主。他认为千秋镜的铸行时间从730年开始,终止于756年。无论是镜背纹饰还是墓葬年代,龙海M13银背镜和裴氏